

現代化、選舉競爭與地方派系： 一九九二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

黃德福*

壹、前言

當代社會變遷與政治發展的研究領域裡，派系政治乃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事實上，以依恃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為運作基礎的派系政治，早已成為社會科學中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固然，派系的組織特性、運作方式與影響程度可能具有差異，惟不論是先進民主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在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政治舞台上，以及重要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派系政治始終扮演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Eisenstadt and Roniger, 1980: 42-47）。

台灣地區的選舉競爭與地方政治，長時期以來受到地方派系的左右，卻也是其他國家所罕見的。自從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在台灣地區實施地方自治、辦理地方選舉以來，地方派系即逐漸主宰或壟斷地方的政治與經濟資源，甚至進而干預中央政治、經濟權力的分配，成為台灣地區政治舞台上強有力且不可分割的一股力量。在不挑釁國民黨統治的政權合法性與政治主宰性之下，地方派系得以透過威權體制內的恩寵體系（patronage system），長期享有地方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獨佔特權，而一黨獨大的國民黨，藉著絕大多數政治、經濟資源的嚴密控制，得以順利獲得地方派系的充分支持，並鞏固了威權體制的統治基礎。由此可見，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經驗顯示，地方派系政治與一黨獨大威權統治是彼此相互輝映的。

八〇年代以來，快速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遷，促成了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弱化，也挑戰了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共生關係，台灣地區地方派系的角色因之受到衝擊。我們不禁要問：台灣地區面臨威權統治的解體，地方派系是否會逐漸的喪失影響力而消逝？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轉型過程裡，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政治結盟關係是否受到影響？台灣

* 作者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 本文由英文初稿增補修訂而成，原稿曾發表於一九九三年九月二日至五日，在美國華府希爾頓飯店舉行的美國政治學會年會。

地區的現代化過程與選舉競爭，是否關係到地方派系的政治影響力？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於試圖經由一九九二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的觀察，配合歷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的相關資料，分析本次選舉中地方派系的影響力，並探討台灣地區的現代化過程與選舉競爭，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所具有的效果。

貳、現代化、選舉競爭與地方派系：文獻檢討

地方派系的政治角色，顯然受到現代化過程相當程度的影響。根據一般的說法，地方派系乃是指那些以爭取地方政治權力，影響地方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或甚至控制地方政治體系運作爲主要目標的政治團體；同時，地方派系的領導人及其追隨者之間關係的維持，主要是仰賴個人的聯繫而非制度的設計。除此之外，雖然地方派系通常也推薦候選人參與選舉，但因其僅以利害關係爲主要考慮，既無正式組織，又缺乏堅定的政治理想與政策訴求，自然有別於以掌握政權爲目的的政黨；不過，當地方議會或政治體系中無其他第二政黨存在的時候，地方派系往往可以取代政黨而發揮相互制衡的功能（陳陽德，民59年：C67-C68；趙永茂，民67年：20）。

有關地方派系形成原因的探討，大致可以區分爲兩種論點。某些學者認爲，地方派系的形成與持續存在，是由於社會關係的網絡強調親屬血緣、友情誼與地域觀念的重要性；另外一些學者則主張，地方派系之所以出現，是源自於威權統治體制下的一個特殊政治經濟交換體系（Bosco, 1992: 157）。然而，不論其形成的原因爲何，地方派系皆是奠基於傳統的社會關係網絡。在一個開發中國家裡，個人的人際關係與行爲模式，注重「特殊化與先天設定（particularistic ascriptive）的取向」，而並不是「普遍化與成就（universalistic achievement）的取向」，故而低度的經濟生活水準、識字率、都市化與大眾傳播媒介接觸，相對增加了地方政治精英的影響力，進而促成了地方派系在地方政治舞台上更爲舉足輕重的角色。

開發中國家快速的社會經濟變遷，導致了多數民眾政治生活的重大轉變。研究社會變遷的知名學者Lerner認爲，對於大多數民眾而言，現代化乃是外在因素與心理因素之間彼此互動的一個複雜過程，結果促成個人心理潛能的充分動員，以及參與式社會（participatory society）的出現。因此，傳統社會的消逝，明顯包含相當程度的都市化過程，以及教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甚至於民主政治的出現（Lerner, 1958:43-57）。誠如Lipset所言，社會經濟發展普遍提昇人民的經濟生活水準、教育程度與大眾傳播媒介接觸機會，無形中擴展了一般民眾的政治視野，縮短了社會階層間的不平等，並疏解中下階層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因而得以降低其採取激烈政治行動的傾向，民主政治的長

期穩定與和平改革才有可能實現（Lipset, 1981: 10）。

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為現代化過程的一個重要面向，對於人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當然也會具有明顯的影響力。根據Deutsch的看法，社會動員指涉「由傳統生活方式邁向現代生活方式的國家裡，絕大多數民眾所面臨的一個整體變遷過程。」（Deutsch, 1961:493）事實上，這個過程包含「居住地區、職業、社會環境、面對面接觸機會、制度、角色、行為方式、經驗與期望及個人記憶、習慣與需求（包括嶄新的團體歸屬模式與個人認同印象之需求）的改變。」（Deutsch, 1961: 493）

為了剖析社會動員對於人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之影響，Deutsch乃進一步提出測量社會動員概念的七個指標，即：(1)接觸現代性的人口；(2)大眾傳播媒介接觸人口；(3)居住地區改變的人口；(4)都市人口；(5)非農業就業人口；(6)識字人口；(7)個人國民所得。而且，上述這些社會動員的指標，彼此間是相互密切關聯的，並對於重大的政治變遷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Deutsch, 1961: 495）。最為重要者，社會動員的過程不僅擴充了政治的領域及與政治相關階層（politically relevant strata）的成員，同時更增加了人民對於政治決策與政府服務的需求，政治參與慾望的升高乃成為必然的結果，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間的直接溝通，因而格外顯得頻繁與重要，民主政治的運作不致流於形式；尤其是，快速的社會動員提高了一個社會滿足人民慾望的能力，擴大了一般民眾政治參與的期望，得以避免少數精英壟斷政治資源與職位，更將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具體實現（Deutsch, 1961: 497-499）。

社會經濟變遷的過程，也連帶影響了社會結構的型態。亞里斯多德以來的民主政治理論家，始終深信中產階級為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石；而整體社會經濟變遷的過程，藉著經濟的成長、工業化的推進、都市化的擴散與職業關係的重組，改變了社會的階級化結構（stratification structure），進而影響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大體上，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造就了一批為數不少且對政治關心的中產階級，藉著集體的力量直接鼓舞了一般民眾的政治參與，限制了少數政治領導精英違法、濫權的可能性，民主政治的穩定運作始得以真正落實（Lipset, 1959: 83）。

由此可見，整體的現代化過程，導致一般民眾政治生活方式的改變。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社會關係的傳統基礎已漸漸喪失了重要性，現代型態的政治組織，如利益團體與政黨等，逐漸成為政府與民眾之間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地方政治精英因而不再能夠主宰地方政治過程；換言之，傳統社會中具有顯著影響力的地方政治精英，特別是結合多數地方政治精英，以利益為取向的地方派系，政治影響力必然隨之而明顯降低。基於以上的論述，本研究因此認為，在一個開發中國家裡，一個現代化程度愈高的區域，地方派系的影響力也相對地愈低，反之亦然。

地方派系的影響力，顯然也與選舉競爭的程度密切相關。雖然地方派系通常必須仰賴選舉而存在，但威權體制與地方派系之間的政治經濟利益互換體系，卻直接阻礙選舉競爭的制度化。在欠缺反對運動或反對黨制度化競爭的情況下，威權體制下的選舉，除了強化威權統治者的合法性之外，於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裡，更賦予地方派系扮演重要的角色。

任何型態的政體，不論其是民主或威權，皆無法免除反對運動的挑戰；然而，反對運動或反對黨的存在，並不能保證民主政治的運作。顯然地，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必須仰賴反對運動或選舉競爭的制度化。固然Duverger主張，只要該政黨能夠充分反映社會中多元化的環境，一黨制也可以和民主政治並存（Duverger, 1964: 278-279）；Macpherson也認為，如果該政黨具有充分的黨內民主，開放性的黨員資格，以及黨內參與的代價不太高的話，一黨制原則上也可以施行民主政治（Macpherson, 1966:21）。Sartori則抱持不同的看法，認為政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和政黨之間的合法競爭，應該予以適當的區分，兩者絕對不可以相提並論；政黨內部的派系鬥爭，純粹只是內部權力的角逐而已，與民主政治的運作不一定有著必然的關聯，而不同政黨相互爭取選民的支持以掌握政權，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關鍵之所在（Sartori, 1976: 47）。由此可見，不同政黨之間競爭關係的制度化，才是一個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表徵；誠如Dahl所宣稱的，一個威權體制的政治轉型，主要是指在全國性與地方性政治舞台之上，反對運動的政治參與和競爭之制度化（Dahl, 1971: 4-14）。

一般而言，威權政體之所以有別於民主政體，在於其對反對運動往往抱持敵視的態度，但不論統治的方式為何，這些威權政體的統治者，通常皆將反對運動視為政治安定的破壞力量與顛覆種子（Linz, 1975: 265-277）。故而，在面對反對運動擴大政治參與的要求時，威權政體即使具有壓制（repression）、動員（mobilization）、有限允許（limited admission）與完全允許（full admission）等四種策略選擇（Weiner and LaPalombara, 1966: 401-407），而為了維持短程的政治安定與有效統治之表象，通常都傾向於壓制或限制反對運動政治參與與競爭的程度與範圍；處此情況之下，反對運動進一步的組織化，必然會成為威權統治的嚴重威脅與挑戰，連帶引起存在於威權政體與地方派系之間依恃關係的弱化，地方派系的政治影響力因之也隨之降低。

既然如此，在一個威權統治的社會裡，反對運動又為何會興起與發展，甚至挑戰威權政體統治權威的合法性呢？促成反對運動興起與發展，以及威權政體轉型的因素，最為關鍵者莫過於選舉的競爭。對於威權統治當局而言，選舉的舉行除了可以增加統治的合法性，以及疏解社會大眾的怨恨與不滿之外，更可以提供威權政體與各式各樣的社會團體發展依恃關係的機會，選舉因而就成為威權政體透過一個政治經濟利益的恩寵體系，

以強化社會控制的有效工具了。

然而，一個威權統治之下的選舉競爭，不論是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或是全面性或局部性的，即使威權政體的統治當局設定嚴苛的限制，均足以提供反對運動組織與動員群眾的有利機會。事實上，透過定期舉行的選舉與競選活動，反對運動得以建立與發展草根性的基層組織，結合反對運動陣營中的政治精英與支持群眾，挑戰威權政體統治權威的合法性；而反對運動力量的進一步擴張與發展，更促成了反對運動與威權統治當局之間選舉競爭的制度化，以及威權政體邁向政治民主化的必然性（黃德福，民81年：136-147），結果動搖了威權政體與地方派系長期而穩固的政治經濟利益交換之依恃關係。

根據以上的論證，威權統治的持續弱化，將會削弱存在於威權政體與地方派系之間的依恃關係；換言之，隨著威權統治當局與反對運動之間選舉競爭的提昇，一個社會中地方派系的政治影響力將會隨之降低。本研究因此認為，在一個由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政體的社會裡，選舉競爭程度愈高的區域，地方派系的相對影響力應該相對地愈低。

一九九二年第二屆立法委員的選舉，乃是台灣地區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面性立法委員選舉競爭，一個較為有系統的經驗分析，必然會有助於吾人瞭解地方派系在台灣地區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本文的主旨，即在於探討一九九二年選舉中地方派系的影響力；透過總體資料的比較分析，首先觀察地方派系在一九九二年選舉裡的影響力，並且運用迴歸分析的統計方法，檢驗現代化與選舉競爭兩者，和地方派系影響力之間的可能關係。

參、一九九二年選舉的總體資料分析

就台灣地區的選舉而言，地方派系始終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因此，不論地方派系的利弊功過為何，瞭解其在選舉競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實為確切掌握台灣地區政治動態的關鍵所在。從一九四六年首次舉行的地方選舉開始，地方派系即在台灣地區的政治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台灣地區自光復迄戒嚴解除之時，至少有一百個以上的地方派系存在過。大體上，早期的地方派系規模較大，時常跨越好幾個縣市，而派系的領導人物也多具有全島性的知名度與影響力。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隨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逐步強化，跨縣市的地方派系聯盟潰散之後，除了台北市之外，台灣地區的地方派系即遍佈於各縣市，其總數約為九十八個；雖然其政治影響力已無法超越一個縣或市，上述所有的縣市皆擁有一個以上的地方派系（陳明通，民78年：11-14, 27-29）。準此，對於台灣地區選舉中地方派系的影響力，有必要進行一番較為有系統的分析。

過去歷次選舉結果的分析顯示，長時期的國民黨威權統治期間，或是解嚴後台灣地區邁向政治民主化的初期，不論是台灣省議員選舉或是台灣省區域增額立法委員選舉，

地方派系在選舉中始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亦即，凡是與地方派系相互結合的候選人，其當選的可能性便大為提高。除此之外，在歷此的選舉之中，國民黨與地方派系形成緊密的聯盟關係；國民黨的候選人裡，與地方派系密切關聯者，當選的機會較非地方派系候選人為高。這個結果意味著，台灣地區長期威權統治的維繫不墜，乃是建立在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依恃關係之上（黃德福，民79年：85-93；Huang, 1990: 728-742）。

那麼，一九九二年的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既為台灣地區首次的全面性立法委員選舉，地方派系的角色到底有何重要性呢？為了便於瞭解本次選舉中地方派系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乃將其與歷屆選舉結果進行比較分析。首先，讓我們觀察地方派系候選人與當選人的分佈情形。表1的資料顯示，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中，地方派系候選人參選的比例不低，佔全部候選人的34.3%，比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九二年間七次選舉的總平均為高；依個別的選舉來看，一九九二年選舉中地方派系候選人的比例，也僅比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五年與一九八六年為低。同表中的資料也顯示，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裡，地方派系候選人當選的比例相當地高，佔全部候選人的54.0%，比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六年與一九八九年等最近四次選舉都還要高。這個結果表示，地方派系在立法委員的選舉中，從一九八〇年的選舉以來，不僅未隨著政治民主化的開展而勢微，反而有逐漸增加影響力的趨勢，一九九二年的全面選舉中，地方派系反而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而且地方派系的候選人，當選的機會也較非地方派系候選人為高。

進一步觀察地方派系候選人的得票率，也可以獲得類似的結論。根據表2的資料，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裡，地方派系所推舉或支持的候選人，平均得票率高達47.7%，比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九二年間七次選舉的平均為高；依個別的選舉來看，一九九二年選舉中地方派系的平均得票率，僅比一九七二年與一九七五年為低。若以縣市別加以觀察，我們發現到，地方派系候選人的得票率，在各個縣市皆相當地高，除了桃園縣與花蓮縣之外，其他縣市皆超過44%。與其他歷次的選舉相較之下，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中，地方派系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換言之，即使台灣地區已逐漸由威權統治轉型至民主政治，地方派系在立法委員的選舉裡，依舊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上面曾經提及，過去四十多年來，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依恃關係，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員全面性選舉，是否呈現不同的風貌呢？由表三中我們發現，國民黨籍的候選人裡，一九九二年選舉屬於地方派系人物的比例出奇的高，佔全部國民黨籍候選人的78.3%，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九二年間七次選舉中最高者；這表示一九九二年的選舉中，相較於其他歷次的選舉，具有地方派系背景的候選人，較有機會獲得國民黨的提名。我們更發現到，與其他歷次的選舉相較之下，具有地方派系背景的國民黨籍候選人，在一九九二年的選舉中當選的機會也較大，其比例高達82.0%，也是一九七二年

以來的七次選舉中最高者。這些發現顯示，一九九二年的選舉中，國民黨仍然與地方派系維持緊密不分的依恃關係。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一九九二年的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中，地方派系依然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地方派系推舉或支持的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比非地方派系候選人來得大。此外，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緊密關係，在一九九二年的選舉仍舊存在著；國民黨籍的候選人，與地方派系緊密結合者，當選的機會也比無地方派系背景者為高。由此得知，和過去歷次的選舉相比較之下，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顯示，在台灣地區邁向政治民主化的轉型過程中，地方派系的政治影響力並未因之而減弱，甚至反而更具有關鍵角色的趨勢。

表1 歷屆台灣省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
與當選人之派系分佈

年	派系 候選人	派系 當選人
1972	39.4% (13/33)	57.1% (12/21)
1975	36.6% (15/41)	59.1% (13/22)
1980	17.6% (18/102)	39.5% (15/38)
1983	24.7% (22/89)	51.3% (20/39)
1986	36.0% (27/75)	46.3% (19/41)
1989	27.3% (44/161)	53.5% (31/58)
1992	34.3% (79/230)	54.0% (47/87)
平均	29.8% (218/731)	51.3% (157/306)

資料來源：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九年的資料，來自黃德福（民79年：90，92）；有關一九九二年的選舉，候選人的派系屬性，取自各報紙的報導。

表2 歷屆台灣省區域立法委員選舉派系候選人之得票率

縣或市	1972	1975	1980	1983	1986	1989	1992	平均
台北縣	39.5	63.7	39.2	53.5	64.7	39.0	44.2	49.1
宜蘭縣	3.0	26.5	2.7	3.5	8.7	31.6	49.4	17.9
桃園縣	74.2	96.3	36.2	43.7	43.9	13.6	28.8	48.1
新竹縣	12.6	5.3	4.8	10.4	17.9	0.0	92.3	20.5
苗栗縣	70.2	96.3	60.7	82.2	62.7	80.6	72.1	75.0
台中縣	68.1	87.9	46.8	61.7	43.3	77.4	59.5	63.5
彰化縣	28.2	23.7	22.1	24.9	44.9	82.3	68.6	42.1
南投縣	29.8	9.0	3.9	4.8	35.4	0.0	59.7	20.4
雲林縣	40.6	11.0	10.8	40.6	6.8	33.3	58.0	28.7
嘉義縣	88.5	94.2	50.2	38.9	25.3	71.2	76.9	63.6
台南縣	88.8	93.2	41.7	29.1	35.7	55.5	60.5	57.8
高雄縣	38.1	53.4	69.0	77.4	91.4	63.2	79.0	67.4
屏東縣	8.0	7.1	9.0	44.7	37.4	96.4	54.9	36.8
台東縣	100.0	94.4	1.8	1.7	0.0	0.0	65.7	37.7
花蓮縣	100.0	76.6	61.9	60.2	0.0	0.0	17.9	45.2
澎湖縣	2.0	1.0	25.5	33.9	46.7	0.0	0.0	15.6
基隆市	9.0	23.0	7.6	77.1	77.5	74.3	58.0	46.6
新竹市*	--	--	--	3.0	48.9	0.0	0.0	13.0
台中市	78.4	49.5	6.0	4.4	7.8	37.0	56.2	34.2
嘉義市*	--	--	--	29.0	43.6	67.9	0.0	35.1
台南市	92.4	95.7	23.9	9.7	33.7	0.0	0.0	36.5
高雄市*	9.0	6.8	--	--	--	--	--	7.9
平均	49.0	50.7	27.6	35.0	37.0	39.2	47.7	40.9

註：* 新竹市與嘉義市原為縣轄市，於一九八二年七月起同時升格為台灣省省轄市；高雄市於一九七九年七月起改制為院轄市，不再屬於台灣省的行政區域。

資料來源：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九年的資料，來自黃德福（民79年：89, 91）；有關一九九二年的選舉，候選人的政黨與派系屬性，取自各報紙的報導，而候選人的得票數，則得自台灣省各縣市選舉委員會編印的選舉實錄。

表3 歷屆台灣省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國民黨籍候選人與當選人之派系分佈

年	國民黨籍 派系候選人	國民黨籍 派系當選人
1972	52.6% (10/19)	52.6% (10/19)
1975	55.6% (10/18)	55.6% (10/18)
1980	47.4% (9/19)	50.0% (9/18)
1983	51.5% (17/33)	54.8% (17/31)
1986	47.1% (16/34)	46.7% (14/30)
1989	52.8% (28/53)	58.5% (24/41)
1992	78.3% (65/83)	82.0% (41/50)
平均	59.8% (155/259)	60.4% (125/207)

資料來源：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九年的資料，同表一；有關一九九二年的選舉，候選人的政黨與派系屬性，取自各報紙的報導。

肆、一九九二年選舉的統計分析

爲了瞭解現代化與選舉競爭兩者，和地方派系影響力之關係，本研究接著利用一九九二年選舉的資料進行迴歸分析。雖然這次選舉是以縣市爲選舉區，本研究是以鄉鎮市區爲基本分析單元。這個分析的策略，主要有下列幾個考慮：(1)鄉鎮市區爲地方派系運作的主要區域；(2)鄉鎮市區爲台灣地區最基層的地方自治單位；(3)同一個縣市裡，鄉鎮市區彼此間存在著相當的差異，無法視爲同質性的整體；(4)絕大多數重要的區位人文總體資料之蒐集，通常是以鄉鎮市區爲最低的單位。

在分析單元的選擇方面，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台灣地區共有三百五十九個鄉鎮

市區，由於地方派系不存在於山地鄉，且配合上一節以台灣省為分析基礎的考慮，本研究乃將台北市的十二個區、高雄市的十一個區及台灣省各縣市的三十個山地鄉排除在外，總共選擇三百零六個鄉鎮市區作為統計分析的基礎。

一、研究假設

基於前面第二節的討論，本研究認為，一個社會裡不同區域之間，現代化與選舉競爭的程度，為決定地方派系影響力的兩個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的假設為：

假設一：現代化程度愈高的鄉鎮市區，地方派系的影響力愈低。

假設二：選舉競爭程度愈高的鄉鎮市區，地方派系的影響力愈低。

二、變項測量與資料來源

1. 地方派系影響力：本研究以地方派系影響力為依賴變項，主要是測量地方派系在選舉中的影響力，因此選定本次選舉之中，所有地方派系候選人在各鄉鎮市區獲得選票的比例，作為衡量地方派系影響力的指標。有關候選人的地方派系歸屬之資料，主要是根據國內各大報紙的相關報導，而候選人在各鄉鎮市區的得票數，來自台灣省各縣市選舉委員會所編印的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實錄。

2. 現代化程度：由於現代化過程涵蓋社會變遷的許多面向，本研究採取四種策略加以測量。首先，現代化的過程至少包括教育的擴張，工業化過程的持續，新生代比例的提高，以及較高速度的人口流動等四個面向，本研究乃選擇四個相關指標來測量現代化的程度，這些指標包括：

(1)高中以上教育人口：本研究以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數佔總人口數的比例，作為測量教育擴張程度的指標；有關各個鄉鎮市區的高中以上教育人口比例，皆由內政部所編印的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中資料計算而得。

(2)非農業就業人口：本研究以第二與第三級產業，即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就業人口之比例為指標；其測量是以第二與第三級產業就業人口，佔十五歲以上總勞動人口的比例為準。有關各鄉鎮市區第二與第三級產業人口數的比例，取自內政部所編印的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民81年）。

(3)新生代人口：新生代由於教育程度、知識水準與政治資訊取得等方面皆較高，比較可以不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故而一個區域新生代的比例逐漸增加，可能代表傳統價值與態度的影響力減弱，地方派系的影響力也會相對降地。為了測量新生代人口的比例，本研究乃將二十至三十九歲的人口數除以二十歲以上的人口數；有關各鄉鎮市區各年齡層的人口數資料，皆來自於內政部所編印的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民81年）。

(4)人口流動率：人口流動率所顯示的，乃涉及一個區域既有社會關係的穩定性，爲了測量人口的流動率，本研究計算不同鄉鎮市區之間，移出人口與移入人口的總人口流動率；有關各鄉鎮市區的移出人口率與移入人口率之資料，皆取自於內政部所編印的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民81年）。

第二個測量現代化程度的策略，便是將以上現代化的四個指標建構成單一的指標。爲了建構成現代化的單一指標，本研究首先將原先的四個指標轉換成Z標準分數，再將這些分數加總後取其平均數，即是本研究的現代化程度之單一指標，這裡稱爲「現代化九〇」變項；就此而言，分數愈高的鄉鎮市區，表示其現代化程度愈高。

本研究第三個測量現代化程度的策略，是根據曾國雄與吳水源有關台灣地區鄉鎮市區都市化程度特性之分析；他們利用十九個現代社會的特性，如人口密度、人口流動率、教育程度、工業化程度與經濟福祉等指標，將台灣地區各鄉鎮市區，依據現代化程度區分爲九級，其中等級愈高的鄉鎮市區，即代表現代化程度愈低（曾國雄與吳水源，民75年：305-308）。爲了分析的方便，本研究乃將他們兩人所區分的原始九個等級予以反轉，以爲測量現代化的程度，這裡稱爲「現代化八〇」；亦即，等級愈高的鄉鎮市區，表示現代化程度愈高。

最後一個測量現代化程度的策略，是來自李朝雄有關台灣地方經濟發展差異的研究結果；他根據人口特性、產業發展、公共設施與財政狀況等四項基準，選定了十二個指標，將台灣省各鄉鎮市劃分爲五個等級，等級愈高的鄉鎮市，其經濟發展的程度就愈高（李朝賢，民79年：2-5）。由於這個研究之中，並未包括台灣省各個省轄市，因其經濟發展程度皆較鄉鎮市爲高，本研究乃將省轄市的區歸爲最高的第五等級，構成了第四個現代化程度的測量指標，這裡稱之爲「現代化八六」；亦即，等級愈高的鄉鎮市區，表示現代化程度愈高。

3. 選舉競爭程度：由於台灣地區的立法委員選舉，是採取複數選舉區的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以致同一政黨候選人之間的競爭無法完全避免，甚至在沒有其他政黨足以構成威脅的情況下，政黨內部的選舉競爭反而更形激烈；不過，本研究以一九九二年的選舉爲研究對象，執政的國民黨確實面臨反對陣營的民進黨之選舉競爭壓力，必然竭盡所能強化政黨內部的凝聚力，以對抗民進黨候選人的外來挑戰。基於此，反對黨與執政黨選舉力量的差異，應爲測量選舉競爭程度的一個良好指標。爲了測量各個鄉鎮市區選舉競爭的程度，本研究乃計算民進黨候選人總得票率與國民黨候選人總得票率的比率；由於各個鄉鎮市區中，國民黨候選人的總得票率，皆比民進黨候選人的總得票率爲高，因此比率愈高的鄉鎮市區，表示選舉競爭的程度愈高。有關候選人的政黨屬性與得票數，皆來自於台灣省各縣市選舉委員會所編印的第二屆立法

委員選舉實錄。

三、研究發現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迴歸分析的結果。基於變項測量的策略，本研究事實上建構了兩個統計分析的模型；其一是以現代化程度的四個指標分別作為獨立變項，另一模型則將這四個指標轉換成現代化的單一指標，並加上其他三個現代化程度的測量指標。以下，第一個模型——模型一的迴歸分析結果，是本研究將要先行討論的重點。

由表4等式一甲的統計數字中，我們發現到，現代化的四個指標，即高中以上教育人口、非農業就業人口、新生代人口及人口流動率等，僅能解釋地方派系影響力百分之九左右的變異量（variance）；而唯有非農業就業人口與人口流動率兩個指標，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具有負面的效果，且皆達0.05的顯著水準。換言之，非農業就業人口愈高，以及人口流動率愈高的鄉鎮市區，地方派系的影響力就相對地愈低。不過我們也發現到，高中以上教育人口與新生代人口兩個指標，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並沒有顯著的作用。

表4：地方派系影響力的決定因素：模型一（N=306）

變 項	等式一甲	等式一乙	等式一丙
高中以上教育人口	-.333 (.215)		-.202 (.225)
非農業就業人口	-.196 (.085)*		-.222 (.086)*
新生代人口	1.141 (.705)		1.203 (.703)
人口流動率	-.033 (.014)*		-.031 (.014)*
選舉競爭程度		-.106 (.038)**	-.073 (.039)
常 數	48.067 (23.552)*	64.718 (2.465)***	47.452 (23.455)*
R-square	.098	.026	.108
修正R-square	.086	.022	.094
F 統計值	8.160	8.000	7.298
F 顯著水準	.000	.005	.000

* .05 顯著水準

** .01 顯著水準

*** .001 顯著水準

同表中的等式一乙顯示，選舉競爭的程度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具有負面的決定作用，且達到0.01的顯著水準；不過，選舉競爭程度僅能解釋地方派系影響力百分之二左右的變異量，顯然不是一個相當具有解釋力的變項。

即使將所有的這五個獨立變項加以考慮，統計分析的結果也呈現類似的發現。從表4的等式一丙中，我們可以發現到，這五個獨立變項能夠解釋地方派系影響力的變異量，也只是大約百分之九左右，與等式一甲沒有太大的不同。而且，同樣僅有非農業就業人口與人口流動率兩個變項，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具有顯著的效果；除了高中以上教育人口與新生代人口不具影響力之外，在等式一乙中具有顯著影響的選舉競爭程度，也同樣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沒有顯著的作用。

模型二的統計分析結果，將是本研究接著討論的重點。表5中等式一丁、等式一戊與等式一己等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現代化程度的三個綜合指標，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皆具有負面的效果，而且皆達到0.001的顯著水準。此外，這三個現代化程度的測量指標之中，以「現代化八〇」最具解釋力，幾乎達到百分之十的變異量，而「現代化八六」與「現代化九〇」兩者，則約在百分之六、七左右而已。

表5 地方派系影響力的決定因素：模型二 (N=306)

變 項	等式一丁	等式一戊	等式一己	等式一庚	等式一辛	等式一壬
現代化八〇	-4.063 (.703)***			-3.784 (.723)***		
現代化八六		-4.655 (.984)***			-4.285 (.994)***	
現代化九〇			-2.015 (.438)***			-1.819 (.449)***
選舉競爭程度				-.059 (.037)	-.078 (.037)*	-.071 (.038)
常 數	76.834 (3.360)***	73.744 (3.406)***	58.775 (1.262)***	78.874 (3.592)	76.917 (3.708)***	62.725 (2.454)***
R-square	.099	.069	.065	.106	.082	.076
修正R-square	.096	.066	.062	.101	.076	.070
F 統計值	33.435	22.381	21.175	18.046	13.523	12.430
F 顯著水準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05 顯著水準

*** .001 顯著水準

表5中等式一庚、等式一辛與等式一壬等，將現代化程度與選舉競爭程度兩者同時納入的統計分析，也呈現與上述三個等式類似的結果。我們發現到，現代化程度的三個綜合指標，即「現代化八〇」、「現代化八六」與「現代化九〇」等，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皆具有負面的效果，且達到0.001的顯著水準；但是，除了在等式一辛中具有顯著影響之外，選舉競爭程度在等式一庚與等式一壬兩個迴歸分析中，雖然也具有負面的作用，卻都沒有達到0.05的顯著水準，可以說是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沒有顯著的決定性。根據這三個等式的統計數字，我們也同樣發現到，在測量現代化程度的三個綜合指標之中，以「現代化八〇」對於地方派系影響力最具有解釋力。

基於以上統計分析的結果，本研究發現到，各鄉鎮市區地方派系影響力的決定因素裡，現代化程度比選舉競爭程度更具有解釋力；而且，在測量現代化程度的變項時，綜合指標的建構比彼此獨立的數個指標，提供一個較為有效的測量策略，這可能是由於現代化過程為一個相當複雜而多面向的過程所致。當然，和本研究原先的假設不符合的是，選舉競爭程度並不是解釋各鄉鎮市區地方派系影響力差異的重要因素。

伍、結語

過去四、五十年來，國民黨長期的威權統治之下，地方派系在台灣地區的政治舞台上，始終扮演著一個相當顯著的角色。八〇年代初期以來，台灣地區快速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遷過程，逐漸促成了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弱化與轉型。處於此一時期，探討在台灣地區逐步邁向已開發國家之林，以及繼續追求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地方派系的政治影響力是否有所轉變，將是一項相當有意義的課題；本研究即基於此一理念，企圖經由一九九二年第二屆立法委員的全面性選舉之分析，深入探討地方派系在本次選舉中的角色。

總體資料的分析發現，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裡，地方派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凡是地方派系所推舉或支持的候選人，其當選可能性比非地方派系的候選人來得高。而且，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之間的緊密關係，在這次的選舉中更突顯了出來；亦即，具有地方派系背景的候選人，較未具有地方派系背景的候選人，被國民黨提名的機會較大，而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具有地方派系背景者，其當選機會也比無地方派系背景者來得高。因此，本研究認為，雖然這是一次全面性的選舉競爭，地方派系在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中，其政治影響力似乎沒有降低的現象，甚至反而更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一九九二年選舉的迴歸分析，確實有助於吾人瞭解社會經濟與政治變遷過程，對於地方派系政治影響力的效果。本研究發現，現代化程度對於地方派系的影響力具有顯著的效果，而選舉競爭程度卻沒有顯著的影響力。這個結果提醒我們，台灣

地區進一步的政治民主化，不必然能夠降低地方派系的政治影響力，甚至會由於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選舉競爭的激烈化，無形中更提昇了地方派系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然而，台灣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以傳統人際關係取向為主的地區，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快速現代化，應該才是降低地方派系政治影響力的關鍵所在，確實值得吾人深思。

參考書目

內政部

1992 **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台北：內政部。

內政部

1993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台北：內政部。

李朝賢

1990 「台灣地方經濟發展差異之研究」，**台灣經濟**，第一六〇期（4月）：1-20。

陳明通

1989 「區域性聯合獨佔經濟、地方派系與省議員選舉：一項省議員候選人背景資料的分析」，行政院國科會「**台灣地區政治菁英的參選行爲**」專題研究計畫報告，未出版。

陳陽德

1970 「**第七屆台中市議會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曾國雄與吳水源

1986 「台灣地區市鄉鎮都市化程度特性之研究」，**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十二期：287-323。

張茂桂與陳俊傑

1986 「**現代化、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投票率之關係：自由派理論的再檢討**」，中國政治學會主辦「投票行爲與選舉文化」研討會論文，7月9日。

黃德福

1990 「選舉、地方派系與政治轉型：七十八年底三項公職人員選舉之省思」，**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五卷第一期（三月）：84-96。

黃德福

1992 **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出版社。

黃德福

1993 「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台灣地區解嚴後選舉競爭的觀察」，**理論與政策**，第七卷第四期（八月）：3-21。

趙永茂

1978 **台灣地方派系與地方建設之關係**。高雄：德馨室出版社。

Bosco, Joseph.

1992 "Taiwan Factions: Quanxi, Patronage, and the State in Local Politics,"

Ethnology 31(April): 157-183.

Dahl, Robert A.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utsch, Karl W.

1961.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September): 493-514.

Duverger, Maurice.

1964 *Political Parties*, trans. of the French edition of 1951. London: Methuen.

Eisenstadt, S. N., and Roniger, Louis.

1980 "Patron-Client Relations as a Model of Structuring Social Exchang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2(January): 42-75.

Huang, Teh-fu.

1990 "Local Factions, Party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nals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61(June): 723-745.

Lerner, Daniel.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Linz, Juan J.

1975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Macropolitical Theor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p.175-411.

Lipset, Seymour M.

1981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2nd e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acpherson, C. B.

1966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rtori, Giovanni.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ner, Myron, and LaPalombara, Joseph.

1966 "The Impacts of Parties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LaPalombara and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399-435.